技术的蔓延与人文知识的重置

马 睿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 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议题向主体性、劳动与资本、艺术与审美等传统学术领域的蔓延, 分别关涉人文知识的哲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和美学维度, 其共同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自我认识。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社会文化各领域引发的经验变动和议题更新, 有必要返回人类社会持续不断的技术进展这一基本事实, 返回人文知识与技术的持续互动这一基本事实, 重新思考人文学科自身的发展路径及其有效性, 尤其是需要从学理上厘清基于启蒙理性的人类观与现代知识体系的根本关联, 探讨人文知识超越现代性架构、进行整体性重置的可能性。

关键词: 人工智能; 人文知识; 主体性; 数字资本; 艺术

中图分类号: I0; J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0) 07-0174-06

技术的增长一直与人类文明史如影随形, 技术所涉及的领域不断从物质领域向非物质领域蔓延, 并日益深入而广泛地参与甚至是塑造日常生活和社会形态。人工智能的发展, 更预示着几乎所有的人类领域, 从科学到艺术, 从经济到政治, 从身体到意识, 从衣食住行到娱乐休闲……无不处于技术所能到达的疆域之内。因此探讨人工智能相关的哲学问题、社会问题、艺术问题,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并不是开启一个全新的问题域, 而是技术与人这一由来已久的议题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延伸——前人的研究能够为当下的人工智能讨论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参照, 当下围绕人工智能议题形成的新知也能够汇入既有的知识传统。尽管如此, 这种延伸仍然要求人文学科面对新的生活世界的挑战, 重申自己的来路, 重设发展的方向。有效回应空前的技术蔓延, 不仅是人文研究的责任, 也对人文学术自身的发展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这里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讨论议题的延伸与知识系统的重置: 一是哲学维度上的主体与主体性问题, 二是政治经济学维度上的劳动与资本问题, 三是美学和艺术维度上的媒介与感性问题。

一、关于人类主体与社会存在

当人工智能经大众传播进入人们视野时, 某些忧惧和茫然经过反复表达似乎变得普遍, 比如, 机器已经由人类的辅助变成人类的威胁, 人和他的工具的关系将发生颠倒, 人自身会成为被智能机器操控的工具人。归根结底, 这是一种自主性丧失的恐惧: 技术的自主性日益凸显, 步步逼近, 而人类的主体性岌岌可危。

但人类的自主性其实既不稳固, 也不是必然。

作为人类自主、自律、自由的基础, 理性主体的确立是一个现代性事件, 笛卡尔之后, 从康德的

认识主体、伦理主体到马克思的实践主体，对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认在各个层面铺开。而19世纪末以来的种种理论学说，则在不断地解构这个主体。主体被认为是人为建构的历史性概念，是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形而上学虚构，缘于神义论之后，需要重新为存在和知识确立以人为基点的合法性依据。主体在理论上是虚构的，在经验层面，主体也只是一个被语言、文化、社会关系等种种外在于人的机制构造出来的产物，其独立性和主动性都相当可疑。大众或许习焉不察，理论研究理应敏锐，在后结构主义和各种批判理论的夹击下，主体和主体性早已七零八落。如此一来，问题产生：被社会文化所建构的主体，不能说没有资格对被技术介入的主体发起审视、表达担忧、发表批评，但至少需要意识到人类的主体性与自主性从来就不是毫无疑问的，至少需要意识到人工智能等技术并非作用于人类意识的唯一外力因素。不能因为前一种作用历史悠久且采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就对之视而不见或欣然接受，也不能因为科技的作用更直接、令人感到陌生就视之为洪水猛兽。

因此，我们尤其需要关注知识传统中那些试图破除基于自然本位而建立的人类自恋的理论学说。比如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和后人类主义，即从不同的切入点达成了对自然本位的批判。

卢卡奇主张建立社会存在本体论，缘于他不认同把关于人和主体的哲学思考全然让渡于认识论，而要从本体论维度讨论人的问题，则必然导向把社会存在视为一种本体性存在，而不是说只有自然存在才是本体性存在。社会存在不仅是与无机自然、有机自然并列的三种本体性存在之一，而且，人类的社会存在纳入了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三大存在类型的共生（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基本差别），乃是各种社会存在的基础……这种存在的形势也是人的各种实践的基础，所以它必然也是人赖以进行各种思维的一个不可排除的出发点”^①。换言之，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本特征，即是从自然存在向社会存在的过渡。

人是社会存在本体的实现者，也是实现行为的产物，即是说，使人自身也脱离了纯粹的自然存在状态而成为社会存在。关于人的社会性，传统的理论探讨偏重社会关系和文化对意识、行为的塑造，对身体的规训，相对忽略技术对人的社会性的推进。其实，很久以来，工具和媒介就在延伸、增强我们的感官，医疗技术就在运用于人体，技术造就的工业环境就在重塑我们的感知和行为，技术一直都是人的社会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或许正是因为，无论在精神意识层面，还是在肉身层面，从所谓自然、所谓天性中出走都是人类不可能回头的宿命，人类才在文化中不断表达对自然存在状态的怀旧，以至于自然本位成为一种信仰。卢卡奇论证从自然存在向社会存在过渡的必然性，为解除自然迷恋，正视技术对主体生成的广泛参与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撑。主体从来都不是自足的，而是关系性的，主体也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存在，而是包含自然性在内的社会性存在。技术是关系性的重要一维，也是社会性的基本要素，它深度地作用于主体，介入主体，并不自人工智能始。

但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依然建立在主客体二元模式之上，他认为社会存在中的物质交换之所以高于自然存在中的物质交换，正是因为前者是目的论行为，是由人的抉择（基于人的需求和人的实践能力）所开启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交换，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换。目的论行为发现自然规律，并且“能够赋予自然规律以某种新的、在自然中并不存在的对象性形式”^②，由此人创造出了在自然存在中不可能产生的事物或事件，因而这种物质交换既是物质过程，也是人的创造过程。显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性的人类主体的强势存在，看到对主体创造性的信任和乐观。主体即使不是自足的，但它在主客体关系中的生成也是人类创造力的证明。

只要对人的理解还依托于主客体二元模式，那么，用人的目的性、创造性来归化技术，就并不能真正缓解技术有朝一日将宰制人类这一类忧惧。因此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的思路是从根本上改变区分主客体的思维逻辑，重建一种不再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观。后人类（posthuman）关

① 卢卡奇著、本泽勒编《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张西平、张秋零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② 卢卡奇著、本泽勒编《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张西平、张秋零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涉两重含义：一是指人机结合而产生的新生物形态，也称为赛博格（Cyborg）；二是由以上事实或预测所触发的对人类的重新认识，并由此质疑现代理性主义哲学框架下的人类观，人的存在不是主体的意识活动，而是意识与身体之间、人与他的工具/媒介之间、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交互状态，在这种交互状态中，前者与后者是混沌不分的。这样看来，本就不存在一个从客体世界中区分出来的人类主体，后者不过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恋想象，而“后人类游牧主体是个多层面的和关系主体”^①。技术人类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这一认识，无论在身体层面还是在意识层面，人类与技术都处于交互性、共生性状态，新兴技术只不过是使这种关系更加显而易见。

祛除人类对自然存在和自主性主体的迷思，从逻辑上来说，这是对自主性丧失恐惧症的釜底抽薪，你不必害怕失去一个你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但逻辑论证未必能驱散人在感性上对技术宰制的忧惧，而且，技术的运用已经日益改变生活世界，并带来诸多人们必须去经历、去面对的现实生存问题。

二、关于劳动与资本的问题

每一次重大的技术进展，一旦成功运用于社会生产，对社会的搅动都是深刻而持久的，比如工业革命对现代社会秩序和世界格局的形塑。因此我们关注的第二种理论资源是技术的政治经济学。劳动和资本，始终是其中的关键因素。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还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但作为其基础的数字技术已有日益广泛的运用，由此在劳动和资本问题上引发的种种现象，已经在当代理论中得到相当活跃的反馈，并形成数字研究这一新的学科领域。

技术的运用带来机器替代、行业更迭，劳动的内容与方式，以及作为劳动力资源的人口的分配和组织方式都发生变化，最终形成新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的“数字劳动”（digital labour，也译为数字劳工），就是为理解数字时代的生产而提出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在福克斯之前，意大利学者蒂奇亚纳·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已使用过“数字劳动”的概念，并明确其作为免费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的性质。^②福克斯的进一步阐述扩大了这个概念的影响，他认为数字劳动以两种方式展开，一是传统劳动被归化为数字劳动，由于传统行业被纳入依赖于数字信息的产业链条，因而传统行业的从业者所从事的劳动也属于数字劳动，比如依赖数字平台接单的服务劳动，比如为数字技术提供硬件保障的工业生产；二是面对各种数字信息而投注注意力的数字劳动，这种劳动产生两种产品——数据和流量，数据可以累积为资本，流量可以转化为现实收益，因而注意力已成为重要的商品。^③大大小小的信息平台通过生产内容来生产注意力，微博博主的粉丝数，网站的用户规模，其实质是被生产出来的注意力，这些注意力是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换的。这里，内容生产仍然属于被纳入数字产业链条的传统劳动，比如写作、拍视频、赛事直播，等等，而属于第二种数字劳动的，是受众贡献注意力的劳动。没有受众的参与，注意力生产不可能完成，但受众的劳动是免费劳动，信息平台并不为投注时间、精力的受众付费，也不为受众参与生产的数据付费；这种劳动甚至是受众根本意识不到的，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获取信息或者是在消费和娱乐。在第一种方式中，人工智能的登场和发展将使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发生极大改变，如何应对这些变迁，不仅是劳动者个人的问题，更牵涉人口治理的重大问题。第二种方式的数字劳动引起更广泛的关注，毕竟，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体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数字信息的受众，他们不仅被卷入注意力生产，他们的意识也被那些通过数字网络运送的文化产品和意识形态在无形中植入。而且，这些文化产品和意识形态的传输是借助日常生活的需求而进行的，几乎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因而数字劳动随时随地发生，并产生巨

① 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7页。

② Tiziana Terranova,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Vol. 18, No. 2, Summer 2000, pp. 33-58.

③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155-275.

大的经济、政治、文化效益。如此一来，主体陷入一个由技术生成的镜像世界，甚至人本身就成为终端，很难从被受众化的命运中逃逸，你以为是自己在筛选信息，其实是算法给了你一个镜花缘式的世界。大型技术公司和与它们有密切关系的政府监管机构在占有注意力的同时，也获取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权力，而这在数字劳动普遍化之前，主要是通过宗教、教育、艺术等文化团体来实施的。

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关系，是更早引起理论界关注的议题。1990年代末，丹·席勒（Dan Schiller）就在《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网络化》一书中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的概念，用于对信息时代的资本运作进行理论描述，并在后续的著述中把“数字资本主义”释义为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指出技术被资本化的结果，不是政治和经济的进步，而是权力的集中，剥削的加剧。席勒的观点在西方左翼学者中较具代表性，他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阶层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阶级分化和信息地缘政治。这个“数字鸿沟”，其实就是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数字时代最强有力的资本不是物质、人力或金融，而是支撑计算能力的技术和硬件设施，以及在运用中产生的数据。显然，数字技术的运用改变的是资本的形式和构成，却不会改变资本的扩张逻辑——一方面是空间维度上的扩张，资本力求进入更多的地区、更多的行业以获取更多收益，因此数字资本的强势拥有者，无论它是某个国家还是某个跨国公司，不仅可以收获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有更大的优势获得制定规则、建立秩序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深度的扩张，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到数字资本，资本不断从物质领域向非物质领域扩张，在后工业时代，文化、信息都已是重要的资本类型，技术也概莫能外，任何有运用前景的技术一定会遭遇资本的吸纳。资本引导社会以实用态度认识技术、筛选技术，形成文森特·莫斯柯（Vincent Mosco）所批判的“数字实证主义”（Digital Positivism）的盛行：云计算的广泛使用，使越来越多的领域用数学工具取代其他工具，片面地依赖定量分析而排斥历史、理论、定性分析和因果分析，从而导致认知思维的单一化。^①

西方学界多个角度展开的数字研究已有一定学术积累，尤其是对技术受制于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的现状的批评，对基于数字劳动而实施的内化的精神控制的批评，为人工智能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参照：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首要问题，可能不是技术自主性对人类的威胁，而是技术带来的日益集中的权力对平等、正义、自由等人类价值的威胁；是技术助长惰性，导致人类思维能力退化的威胁。技术一旦产生，对技术的运用很难遏制，那么对可能由此产生的新的社会图景及其问题，还是需要人类的智慧来规划整体的应对体系。实现这一规划需要持续性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全方位探索。

三、AI 艺术中的媒介与感性问题

在艺术领域，媒介与感性构成相互生发的关系，而技术是新媒介的重要来源。

人类通过艺术活动，不断地把普通物创造为艺术媒介，无论它是天然物，还是人造物。围绕不同媒介，分别形成各种艺术门类。普通物之所以成为艺术媒介，其本质在于艺术敞开了人与这些媒介物之间的感性关联，换言之，艺术活动发掘出媒介物在认知功能和实用功能之外的感性意义，这是人类感性对物的占有。不存在于自然，而是从技术活动中产生的媒介物，比如人造的纸张笔墨，乐器发出的声音，摄像机拍摄的影像，直至今日的VR，诸如此类，当它们成为艺术媒介，这些新增的感性对象使感性本身得到扩展，这是物对感性的激发和丰富，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是推动感性拓展的重要力量。论及新媒介艺术，当下理论界讨论较多的交互式、沉浸式特征，大都是对感性体验的描述和归纳，可见这些新兴的技术物正在经由艺术生发出新的感性。在传统艺术中，交互式、沉浸式体验并非

^① Vincent Mosco, *Marx in the Cloud: Marx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edited by Christian Fuchs & Vincent Mosco,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6, p. 518. <http://www.cnki.net>

缺席,但主要发生在接受过程中,而新媒介艺术从创作过程就开始进入交互、沉浸体验,并使创作与接受成为同时的、同一的过程。新媒介艺术创作过程、创作方式的变化,也改变了艺术家,新媒介艺术家更像是一个艺术事件或艺术项目的策划者,而艺术作品的最终完成,则是与技术平台合作甚至也是与观众合作的产物。2017年12月,在加拿大设计博物馆举办的多伦多设计、创新与技术博览会(EDIT 2017)中,展出了一件沉浸式装置作品《星状细胞》(Astrocyte),这是一个由众多组件构成,由AI调控的集可视、可听、可触、可闻为一体,并能够与观众形成互动的同感空间。这件作品由Living建筑系统集团(LAS)联合多位艺术家、科学家、设计师及工程师合作,试图展示建筑是活态化的,有生命的。^①《星状细胞》对Living建筑理念的表达,本身就意味着需要把观众的感性体验吁请为作品的一部分。创作者、作品、观众三者的身份和职能均处于混沌交缠状态,是当前AI艺术中常见的现象,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认为艺术品的价值路径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沿用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崇拜价值与展示价值此消彼长的论证逻辑,那么新媒介时代的艺术品凸显的是其参与价值,观众不是在作品完成后参与观看、理解、鉴赏过程,而是和机器以及作为策划者的艺术家或技术团队一起直接参与对艺术品的完成过程,因而艺术品是一个在参与和交互之中实现人机关系共塑的场所。由此,人机关系具有了艺术和审美的维度,人机关系的共塑也进入了艺术感性的领域。

技术不仅通过新媒介进入人类感性领域,进而生成新的艺术门类;技术还试图让机器直接成为传统艺术门类的生产者,当前人工智能正在尝试绘画、写诗、作曲,并产生了一些似乎可以乱真的“作品”。当然,在目前的技术阶段,机器创作与人类创作的相似性还仅仅存在于作品这个环节,机器在识别和制作作品的过程中并无人类艺术家的主体体验,其行为基于算法和数据,而不是感性。一方面,机器的学习过程看似像人类一样,从过往的大量艺术作品中提取审美范式,然后以此为基础创造新的视觉图像。另一方面,算法和数据是由人赋予机器的,在这个意义上,机器仍然是人的媒介。而且,目前的机器学习尚不具备迁移能力,尽管人工智能交互技术已经发展到多种“感官”混合运用的阶段,比如,微软的AI能够根据文字描述生成图像,但机器从诗歌艺术中获取的审美原则仍然不能作用于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机器还没有发展出人类的通用于文学、绘画、音乐、书法、建筑诸领域的艺术感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机器的作品无法对人类感性产生影响,艺术作品是人类发展审美感性的一大来源,如今,这个来源中或许要加入并非出自人类之手的作品。2018年,AI作品《爱德蒙德·贝拉米》(Edmond de Belamy)在纽约佳士得拍卖,最终成交价是其估价的近45倍。这是一个标志,显示人类已经开始把机器的作品链接到原本由人类作品构成的序列之中。

总之,从感性生成这个角度看,无论是经由艺术媒介发挥影响,还是直接通过生产作品发挥影响,技术都已经介入了艺术领域。

作为主体性的一部分,审美感性当然不是纯粹自足而自为的,而是由个体携带的人类文明的遗传基因。社会性参与了人类的身体演化,如同人类的整个存在一样,人类感官的审美功能也是生物性和社会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技术与艺术相互参与的结果。人工智能对艺术和感性的介入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但研讨AI艺术,不应仅仅停留于印证既有的结论。事实上,尽管当前的AI艺术还处于探索尝试阶段,但已经向艺术理论提示了新的命题:一是艺术媒介的智能化。人工智能的作品是人类和机器合作的结果,人类提出创意,设定算法,选择作品数据,然后机器给出作品,此时,机器仍然是使人类意图得以呈现的媒介,但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个媒介具有不可控性,策划、实施人工智能艺术项目的人类团队,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都不知道机器最终会生成怎样的作品。媒介本身具有了一定的智能属性,这是人工智能与此前一切媒介的根本区别。媒介的属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艺术的样态,如果AI艺术形成一个新的艺术门类,这个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媒介将如何改写艺术的定义?在人与媒介的感性关系中是否会产生新的关系模式?二是艺术创作主体的分离,在传统艺术创作中艺术

家既是创作意图的发动者又是形式载体的实现者，在 AI 艺术中，形式载体是由机器完成的。尽管在一些装置艺术、现场艺术中，类似的分离已经出现，但艺术家作为整个作品的策划人，始终处于主导、核心地位，具体的操作者并不会在最终的作品中呈现自身面目，而 AI 艺术中的形式载体由机器创造，这个过程对艺术家来说是不可控的。如此，艺术家在 AI 艺术中的在场方式将发生重要改变。三是 AI 艺术呈现出来的参与价值，以及在感性领域展开的人机共塑，是否为艺术开启了新的意义方向和文化功能？AI 艺术的创作者并非个人，而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合作者，甚至还纳入了观众；AI 艺术作品的完成并不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与观众互动的每一个瞬间，都生成作品的一个样态。因此，跨界共享的艺术体验，无穷瞬间的持续涌现，或许是 AI 艺术最具吸引力的感性维度。同时，AI 艺术立足于跨界共享与公众参与而生成作品，这种方式如果成为新的艺术生产模式，成为文化惯例，那么艺术参与或将在不远的未来成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人类艺术起源的重返。

文艺复兴以来，审美和艺术的地位一路上扬，部分填充了在世俗化进程中退场的宗教留下的信仰空白，在以人自身为终极意义的现代秩序中担当了宗教曾经担当的功能，艺术的审美自律成为维系其超然地位和神圣性的核心价值，感性也因此获得地位。经典美学为这种神圣化建构了理论基础。究其根本，经典美学、现代艺术理念，与启蒙思想的人类观是一体的，而理解 AI 时代的艺术，需要人类观的再次迭代。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的尝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提示我们重新思考人类观，而人类观的改变将开启整个知识体系的重构，就像启蒙时代曾经发生过的那样。

四、人文社会学术的系统重置

无论是前现代时期的简单技术，还是正在逼近的人工智能技术，技术一旦产生就必然开启从物质领域向非物质领域的蔓延，在历史上，人类的生命存在、社会关系和艺术活动之中，始终都有技术的作用，技术研究当然应该是人文社会学科体系的重量级构成部分。而我们更希望强调的是，技术本身就是知识史的主线之一，那些推动人类社会进程、重塑人类整个生活世界的关键性技术，比如冶铁，比如蒸汽机，事实上触发、带动了思想、知识、学科、文化的普遍重构。

轴心时代被视为人类古代文化的奠基，在时间上和冶铁技术的普及高度重合。“铁器时代”是人类重要的历史分期，从人类最早使用冶铁技术到铁器广泛运用，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主要文明区域的完全铁器化，在时间区间上大多集中于轴心时代。彼时，这些区域的先哲不约而同开始在肉体生存之外思考人类存在的价值、意义和规范，这是人类观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普遍性建构，也是古典知识体系的奠基。

从现代科学的发展到工业革命，是技术运用的又一划时代事件。马克思所强调的“工业的历史”，见证了这个过程，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了整个生活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段，以启蒙哲学的人类观为基础的现代思想体系和学科体系逐渐建立起来。

人工智能技术会触发第三次知识形态的整体演变吗？从计算能力的快速提升到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人工智能的桅杆已经升上海平面，生活世界的再次改变也已经来临，人类需要再一次发起重大而集中的思想和知识的生产。不是各个学科各自为政，仅仅在自己的田地里精耕细作，而是类似于轴心时代、启蒙时代的思想生产那样，重建一种普遍知识，这种普遍知识是基于正在开启并向未来延伸的生活世界，它将重新审视学科疆界与学术伦理，它将重新确立人类认知和实践的合理性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后人类主义提出的理论愿景——以更新人类观为核心，重建普遍知识——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起点。